

「精英」失序的世界

——閻連科《丁莊夢》及其國家隱喻

• 黃 勇

閻連科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丁莊夢》^①，講述了後集體化時代中原鄉村丁莊歷經「集體賣血—染病—死亡—毀滅」的故事，藝術地再現了1990年代以來河南省「艾滋病村」怵目驚心的災難爆發過程。本文關注的是：在這場偶然性與必然性交錯的災難中，丁莊的所謂「精英」人物李三仁、丁水陽、丁輝、賈根柱及丁躍進等的職責、反應及行動。丁莊人在物欲與災難面前的進退失據，很大程度上可歸因為丁莊精英的應對失序，閻連科精準地刻畫了他們的無奈與無力、無行與無義。這些「精英」的表現，絕非丁莊所獨有，他們在同時期的中國鄉村普遍存在。循此路徑，作者直叩「丁莊即中國，中國在丁莊」這一與國家現實緊密相關的主題。

一 楔子：鉅變中的失語

《丁莊夢》裏的丁莊，是一個位於河南省豫東平原的典型小村，封閉而

平靜，村民過着貧困、清苦的田間生活。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前夜，丁莊的日常生活與秩序，仍然殘存着集體化時代（1950至1970年代）的影響：「相對於傳統時代的村莊而言，這是一種更為孤立和封閉的社會結構單元。……集體化時代的實踐在某種意義上塑造了一種真正的『小國寡民』的村莊生活。」^②然而，這種安於清貧的狀況與秩序並不穩固，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達到頂峰的1990年代初，在當地政府發展血漿經濟的鼓動和誘導下，丁莊人走上了「集體賣血—染病—死亡—毀滅」之路。在這條不歸路上，丁莊的農民一度收入不菲，然而數年後，伴隨賣血而來的不治之症——「熱病」（即艾滋病），奪去了大多數鄉民的性命，丁莊因此盛極而衰。

這是二十一世紀初年為數甚多的「艾滋病村」的命運縮影。賣血之前表面平靜的鄉村，實際上正處在脆弱的轉型期：一方面，國家的力量大面積撤退，集體名存實亡，公共權力處於半真空狀態；另一方面，新的鄉村公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講述了後集體化時代中原鄉村丁莊歷經「集體賣血—染病—死亡—毀滅」的故事，藝術地再現了1990年代以來河南省「艾滋病村」怵目驚心的災難爆發過程。

* 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轉型期中國鄉村的倫理人情衍變」（10JYB2007）階段性成果。



《丁莊夢》書影

賣血和染病對於丁莊這樣一個平原的封閉農村來講，無疑是一場與每個村民生死攸關的鉅變。在這場鉅變中，值得關注的是丁莊「精英」的更迭，因為鄉村精英呈現出來的深刻變化，是整個社會大轉型的一個反映。

私生活與秩序尚未形成，亟待重建。對國家退出後的鄉村公共生活，閻雲翔有精闢的論述：「自80年代以來，公共生活衰落，社會秩序惡化，鄉村社區也在解體。地方政府和村幹部對農民予取予求」^③，不僅如此，「國家在撤除了對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經濟支持後卻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會自組織，這又使得已經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④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該時期國家對鄉村的影響，並不因為集體化時代的終結和國家權力的撤出而不復存在。在丁莊，這種影響尤其體現在地方政府對賣血經濟的大力鼓吹，對李三仁的罷免，對丁輝倒賣行為的扶持，以及對賈根柱、丁躍進竊取丁莊權力的默認等一系列事件之上。如是種種，我們明顯看到，國家公權力對鄉村重大事務的直接干預與影響依然有力而深遠。

當熱病陸續爆發、死亡大規模蔓延之時，在丁莊的世界裏，國家、宗

族、精英等各種力量集體失語、失位，村莊進而呈現出混沌、無序和暗湧的亂象。賣血和染病對於丁莊這樣一個平原的封閉農村來講，無疑是一場與每個村民生死攸關的鉅變。在這場鉅變中，值得關注的是丁莊「精英」的更迭，因為鄉村精英呈現出來的深刻變化，是整個社會大轉型的一個反映。《丁莊夢》既刻畫了有擔當的舊政治與宗族／文化精英的無奈與無力，更描摹了無道義、無底線的新經濟與新政治精英唯利是圖的鑽營與貪婪。

二 政治精英

傳統鄉村的秩序與正常運轉，主要是靠「精英」來維持和保障。大體而言，相對於一般群眾，農村精英是指對村莊的日常生活與秩序起着重要影響的少數人物。在經歷新中國多年社會主義革命（土改、合作化等運動）滌蕩、改造後的鄉村，倫理價值觀和權力秩序遭遇根本性的重新洗牌，注重社會、經濟和文化積累的舊精英被打倒和取締，取而代之的是以階級出身和政治態度為標準的鄉村代理人。賣血之前的丁莊，在很大程度上延續着集體化時代的政治精英治理狀態，只是略為鬆散而已。

自1980年代以來，國家的力量大部分撤出之後，權力呈現碎片化的轉型期鄉村，「正在發生着劇烈而又快速的變遷，在此過程中，農村精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存在着農村精英循環和精英再生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出現往往會對原有的村莊結構和村莊政治產生重大影響。」^⑤再度洗牌的新、舊精英，表現迥異，而後集體化時代的鄉村，由於「社會關聯程度

低下，村民之間缺乏共同意識與道德輿論約束，只有利益的計算，這種原子化的村莊生活增大了精英資源整合及精英獲取資源的難度。……村民原子化的程度越高，其與社會的對話成本越高，就越不利於其利益的保障，從而容易滋生不滿與對立情緒^⑥。由於缺乏強力而高尚的精英人物或者社會組織，「其所導致的結果於是成為個人的崛起和社會的衰弱」；更進一步，「這種自私的個人化使所有人都合理合法地妄[罔]顧公共福利和社會健康」^⑦，造成當今中國社會各種尖銳的矛盾與病症。對此，《丁莊夢》述說備至。

為了更好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借助於社會學領域對農村精英的劃分方式並稍作調整，將農村精英分為「政治精英」、「宗族／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三類^⑧。《丁莊夢》裏相對應的人物形象分別為政治精英李三仁、賈根柱、丁躍進，宗族／文化精英「我爺」丁水陽，以及經濟精英「我爹」丁輝。如果從精英的代際更迭角度來講，上述精英又可分為「傳統精英」和「現代精英」兩類，其在小說中的對應者分別為傳統精英李三仁、丁水陽，現代精英丁輝、賈根柱和丁躍進。

先說政治精英。集體化時代的鄉村，在國家權力籠罩下「形成了一元性政治精英結構形態」^⑨。新形成的政治精英「與舊的士紳階層背道而馳：無財產，無良好的教育，原階級地位低下」^⑩。他們本身實際上缺乏令人信服、崇敬的能力與魄力。由於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來自上層的政治賦予，因而其權威更多是以非自然的、人為的方式而形成的。這種「偽精英」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乃是國家權力在鄉村的具體代理人，他們「所代表的更多的

是國家的利益。……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已經不具有人格上的獨立性，充其量不過是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傳輸者和執行者。相比舊有的精英而言，他們缺乏對鄉村社會規則建構的能力和對鄉村秩序維護的自覺性」^⑪。他們「在政治上絕對地緊跟上級，盲從政策，較少關心顧及農民利益，更多的是作為上級管理鄉村的代表，而逐步地減弱了為鄉村利益吶喊的職能，逐漸失去廣大農民的擁護支持」^⑫。

由於這種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鄉村治理模式的相對極端性，使得這些政治精英的治理難以持久。特別是集體化時代終結和改革開放後，隨着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此消彼長，這種一元性政治精英結構很快遭到侵蝕：「在『分田到戶』中最能感到失落的可能是村幹部了，……與其說『分田到戶』分掉的是集體的土地和財產，不如說是他們手中的權力。」^⑬鄉村權威和秩序開始了漫長的重建，「只是國家對於鄉村權威與秩序的構造仍然具有主導性地位。……鄉村社會似乎有了很大的自治空間，但實際上這種制度依然是在國家權力的監控之下，是賦權型的制度」^⑭。

小說開場描繪了因督促賣血不力而遭罷免的老村長李三仁。其實，作為老資格的退伍軍人，李三仁在村長的位置上，兢兢業業帶領丁莊人奮鬥了四十年。如果比對1940至1960年代的革命小說如周立波《暴風驟雨》(1948)、柳青《創業史》(1959)、浩然《豔陽天》(1964)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李三仁就是一個中老年版的郭全海、梁生寶或者蕭長春。在集體化時代，只要他們以黨在農村的代理人身份緊跟黨的號召與步伐並執行其命令，就能維持權威。因為「在1978年之前的社會，

進入以經濟收入為主要衡量標準的市場經濟社會以後，新的價值觀與評判標準使得李三仁失去四十年帶頭人的「權威」，隨之「不名一文、煙消雲散。他被罷免，正是這批政治精英淡出農村社會舞台的序幕。」

小說中最能體現宗族、血緣、地緣因素不敵財富、有用性原則的是丁水陽。丁水陽本來享有精英的天然位置，但他在上面的鼓動下號召大家賣血以後，地位很快就下降了，因為整個村莊的權力已經轉移到血頭那裏。

則是以國家和國家所任命的幹部，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統治鏈，……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其所形成的威權有時依賴國家暴力維持，有時甚至乃是自覺的。也就是說，這種威權被廣泛承認並自覺屈從」^⑩。

可是，隨着集體解散，「基層公共權力合法性下降，鄉村幹部在村莊中的道德形象並不為村民所認可。」^⑪在進入以經濟收入為主要衡量標準的市場經濟社會以後，新的價值觀與評判標準使得李三仁失去四十年帶頭人的「權威」，隨之不名一文、煙消雲散。他被罷免，正是這批政治精英淡出農村社會舞台的序幕。

政治精英如此，宗族／文化精英與經濟精英呢？

三 宗族／文化精英

宗族在中國傳統鄉村發揮重要作用，早已人所共知。1949年起的社會主義革命，曾經將宗族的現實作用降至歷史最低點，並代之以「階級」和

「集體」的觀念。「『大集體』生活消失後，……國家權力從村民日常生活中隱去，宗族觀念曾一度對村民間關係的調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是，隨着財富標準主導村莊社會層級結構之後，致富變得比致富的手段更為大多數的村民所看重」^⑫，伴隨着這一變化，「在村民處理與家庭外村民關係時，有用性變成了主導原則，而與此相背的關係則疏離化（即便依據血緣或地緣因素其關係更近）。」^⑬也即以下說法所表述的那樣：「非集體化之後，國家作用的急劇減少則對農民的私人生活也有着同樣重要但恐怕是更為負面的影響。……農民中出現了一種極端實用的個人主義。」^⑭這一實用個人主義，輕易戰勝了宗族、信仰與文化的約束。在許多地區，「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實體，進一步弱化了宗族的經濟職能。宗族，或者說是大家族，僅僅保留禮節上的日常往來，以及經濟事務上一定的相互幫助。」^⑮

在小說中，最能體現宗族、血緣、地緣因素不敵財富、有用性原則的是丁水陽。丁水陽首先具有較高的



宗族在中國傳統鄉村發揮重要作用

文化身份與道德身份，加上「作為年齡大和輩分高的人，本來享有精英的天然位置。但他在上面的鼓動下號召大家賣血以後，他的地位很快就下降了，因為整個村莊的權力已經轉移到血頭那裏，而最大的血頭卻是他的兒子」^⑩。在熱病病人集中到學校居住的初期，丁水陽由於在學校的特殊地位和召集人的身份而尚享有崇高威信。但很快其患熱病的小兒子（「我叔」）丁亮由於與堂弟媳玲玲亂倫，被賈根柱、丁躍進有預謀地當眾揭發，丁水陽再度遭受排擠，被迫讓出學校主管者的位置——而丁莊隨後發生的道德大滑坡，正是從丁水陽下台開始，最後蔓延至整個村落。

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丁家一族裏，德高望重的丁水陽，對自己的兩個兒子，對本家晚輩丁小明、丁躍進的種種行徑，其影響力、約束力庶幾為零。在現實利益面前，家族內部的輩分秩序、教化訓導，被年輕一代棄之如敝屣。這與改革時代的鄉村公權衰落緊密相關：「在糾紛解決及越軌行為懲戒方面，……村莊公權普遍衰落，村莊內部自主解決糾紛的能力弱化，實施懲罰的能力則幾近消失。」^⑪晚輩在丁水陽眼皮底下，肆無忌憚地幹着買血、賣血、倒賣、亂倫、欺詐等勾當。丁水陽妻子被兩個兒子收購來的鮮血驚嚇而死，但仍然無力阻止他們違背誓言，繼續收購鮮血發財。丁莊孝道之衰，足見一斑。

在丁莊的賣血歷程中，我們除了看到宗族血緣的無力之外，丁莊人的信仰與文化，也在競富欲望與疾病威脅的雙重夾攻下，毀亡殆盡。

美國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的研究指出，近代華北的許多村莊，

除了「以村廟為中心的宗教組織」外別無其他組織，而且該組織是社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會首「往往還擔負起組織全村性的非宗教活動的責任」^⑫。賣血之前的丁莊，在鬼神崇拜方面，與傳統的村莊並無二致：莊南一里半，聳立着一座關公廟。在「求財」的路上，丁莊人先拜關公，後信賣血^⑬：

想發財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幾十年，末了還是賣血掙了錢，也就扒了廟。不信關公了，信着賣血了。

關公廟的推倒，在丁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丁莊人改鬼神信仰為金錢崇拜，在發展經濟、發家致富的道路上爭先恐後、漸行漸遠，把靈魂與信仰丟棄腦後。梁鴻筆下的河南梁莊，與丁莊相類：「整體的、以宗族、血緣為中心的『村莊』正在逐漸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宗族家庭之間的感情往往很淡。」^⑭譚同學對湖南橋村的社會學研究，於此同樣適用：「村莊權力格局和道德秩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村民的信仰系統陷入了紊亂。……導致村民生活的無意義化、現時化和高度自利化，不僅缺乏公德成為村莊普遍的道德事實，村民私德出問題的情況也已經大量存在。」^⑮而其後丁莊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村民陷入了信仰缺位的困境。村民的宗教信仰……均難以抵擋金錢壓力的衝擊。……多數村民（尤以年輕者為主）不再對此有敬畏之心。」^⑯

即便是關公廟的代替者——學校，在熱病爆發期間也被廢棄不用，最後在賈根柱、丁躍進等人手裏被拆窗搬椅、洗劫一空。作為「公產」的學

作為「公產」的學校被瓜分殆盡的命運，甚至比關公廟的倒掉還要殘酷：它標誌着丁莊人對文化重建、對後代教育培養的理想與信念的摒棄與絕望。正是丁莊人自己，親手掐滅了所謂「未來」和「希望」。

校被瓜分殆盡的命運，甚至比關公廟的倒掉還要殘酷：它標誌着丁莊人對文化重建、對後代教育培養的理想與信念的摒棄與絕望。正是丁莊人自己，親手掐滅了所謂「未來」和「希望」。

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一書中，如是解讀鄉村學校的消亡^⑧：

是這個村莊文化氛圍的消失，一種向上的精神的消失，……如果從一個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它又不僅是一所小學去留的問題。對於梁莊而言，隨着小學的破敗，一種頹廢、失落與渙散也慢慢瀰漫在人們心中。在許多時候，雖然它是無形的，但它最終卻以有形的東西向我們展示它強大的破壞力。

丁莊也是一樣。對於這一切的發生，老一輩精英如李三仁、丁水陽等不無努力過、阻止過，但遭受了螳臂擋車式的失敗，回天無力；連李三仁自己也被疾病吞噬了生命。學校的廢棄與老人的故去，其意義與影響是深遠的。「隨着學校在村莊的停辦——它可以看做是統攝整個村莊向上精神的象徵物，隨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們往往是村莊的心靈指向和道德約束，村莊從內部開始潰敗，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莊。這一潰敗意味着中國最小的結構單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⑨這是梁鴻筆下的梁莊，也是閻連科筆下的丁莊。

除了宗族身份外，丁水陽在丁莊也是為數極少的文化精英。但是這一身份在賣血狂潮中，同樣顯得尷尬與無力。這與1949年之後鄉村精英文化功能的缺失和鄉村文化的衰落息息相關。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農村，從

農業合作化到改革開放，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先後佔據着鄉村社會的主流與核心，與此同時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批判與打倒了舊精英階層，而文化和宗族精英則受到壓迫與排擠，淪落為鄉村的邊緣人群。「鄉村社會空間的被擠壓、鄉村知識份子的被遺忘、傳統文化力量的被批判等，都使得代表了傳統文化的精英隊伍不斷散落以至無處可尋。」^⑩由此更進一步，「傳統鄉村社會依賴於文化進行的自我組織、自我調節功能完全喪失，群眾運動成為黨和國家調控農村的最有效手段。即使是改革開放後，鄉村政治、經濟功能得以恢復，鄉村社會的文化功能也已經因為傷動元氣而難以復蘇了。」^⑪改革開放使許多原來鄉村的黨政幹部轉變為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大量迅速崛起的經濟能人被吸收進社會控制集團。新的政治精英扮演着既要代表國家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眾的雙重角色；而「傳統鄉村精英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則逐漸在歷史的變遷中影響甚微及至消失殆盡了」^⑫。

那麼，年輕的「精英」哪裏去了？

四 經濟精英

杜贊奇對現代華北鄉村裏維繫政府與鄉民之間的「經濟人」所作的劃分，分為「保護型經紀」和「贏利型經紀」，後者被定義為「視鄉民為榨取利潤的對象」，由於「這類經紀對待鄉民的貪婪性、甚至掠奪性」，也可稱他們為「掠奪型經紀」^⑬。按照杜贊奇的說法，丁莊的傳統精英更接近於「保護型經紀」，而且他們正陷入無力和困境——李三仁權威不再、病入膏肓，

在丁水陽、李三仁等傳統精英失去了保護丁莊的能力之時，丁莊年輕一代的現代精英——丁輝、賈根柱、丁躍進之流，粉墨登場，這是一群接近「掠奪型經紀」的人物，他們先後混進權力體制內，竊取國家權力。

丁水陽兩度蒙羞、心存愧疚。作為「較多地體現傳統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精英」，他們正在步履蹣跚地老去。儘管他們勉力支撐、維繫着鄉村社會傳統道德的評價體系和社會穩定，但隨着社會價值觀念的急遽變化，無可避免地，他們「在農村社會精英中所佔的比例在減少……。傳統精英對農村社會的影響也在下降」^④，他們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作用日益減少，其殘存的影響力主要存在於中老年農民群體。

在丁水陽、李三仁等傳統精英失去了保護丁莊的能力之時，丁莊年輕一代的現代精英——丁輝、賈根柱、丁躍進之流，粉墨登場，這是一群接近「掠奪型經紀」的人物。「現代精英體現的是現代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年齡一般在35歲左右。他們文化水平高，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精力充沛，艱苦創業，又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他們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開拓者。」^⑤在閻連科的小說裏，他們先後混進權力體制內，配合地方政府以竊取國家讓渡給村莊的大部分利益與權力，中飽私囊。

貧窮的丁莊本乏經濟精英，但是通過賣血造就了第一批「先富者」——「血頭」。他們以抽取別人的血贏利致富，是一批缺乏嚴格的道德約束，為贏利而罔顧賣血者身體健康多抽血的人。他們遊蕩於街巷、田野之間，恍若現實版的「吸血鬼」。丁水陽之大兒子丁輝乃箇中翹楚。他抓住了政府力推「賣血」這一契機，成為丁莊第一個「血頭」，引爆了丁莊的賣血風潮，並成為丁莊首富。他進而與高副縣長勾結合謀，以「救濟」之名倒賣棺材、配對冥婚以盤剝鄉民、牟取暴利，大發

死人財之餘，扶搖直上，成為體制內的官員。

丁輝作為地方政府與鄉村之間的核心聯繫人，壟斷性地掌控了上下溝通的要道，道貌岸然地上下通吃，毫無疑問是小說中「惡」之集大成者。丁輝的所作所為，使我們想起俄國作家果戈理(Nikolai V. Gogol)名作《死魂靈》^⑥裏企圖通過購買死農奴名額牟利的六等文官乞乞科夫。只不過與乞乞科夫相比，《丁莊夢》裏的社會更加令人窒息與絕望而已。

對於丁輝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閻連科在某次訪談中認為不無遺憾^⑦：

偉大的作家應該像托爾斯泰那樣，愛他筆下所有的人，愛他的敵人，愛他的仇人，但在《丁莊夢》中我沒有做到這一點。這主要體現在丁輝身上，和其他人相比，丁輝可能寫得單純了點，不那麼可愛，但他更能讓人感受到隱藏在社會後面的不易言說的東西。我對丁輝的愛是有限的，這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最大遺憾。

丁輝的飛黃騰達，反映了地方政府借助「掠奪型經紀」，通過倒賣棺材、發救濟糧油、配對冥婚等措施，對鄉村社會持續不斷的調控與盤剝。

而在丁莊內部，同樣上演着類似奧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戈爾丁(William Golding)《蠅王》(Lord of the Flies)那樣的爭權奪利。行將就木的熱病病人賈根柱、丁躍進狼狽為奸：他們在病人聚集的學校裏，合計上演偷竊丁莊公章，以及對丁亮的「捉姦」把戲，終於取代丁水陽成為丁莊熱病病人的「首領」，進而號令全村。隨即，他們

在丁莊內部，同樣上演着類似奧威爾《動物農莊》和戈爾丁《蠅王》那樣的爭權奪利。行將就木的熱病病人賈根柱、丁躍進狼狽為奸，二人的作為逾越了多項鄉村傳統道德禁忌與底線，進一步加快了丁莊走向毀滅的腳步。

隨着精英的變換及鄉村權力話語的轉移，傳統的鄉村文化基礎在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之後，再度遭受商品經濟大潮的重創。鄉村的文化功能日漸衰落乃至喪失，丁莊也隨之失去了生命力。

倆以丁莊「熱病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大肆瓜分學校、村莊的公共財產，乃至發棺掘墓。二人的作為逾越了多項鄉村傳統道德禁忌與底線，進一步加快了丁莊走向毀滅的腳步。倘非身患絕症，賈根柱與丁躍進勢必成為類似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中趙刺猬、賴和尚式的無賴村霸^⑧。

在《丁莊夢》中，無論是上級劃撥的救濟物資（如糧油、撫恤棺材），抑或村莊共同體的公共財產（如學校、集體樹木），在李三仁、丁水陽失勢後，均為丁輝、賈根柱、丁躍進等人所掌控與瓜分；換言之，作為連接上下之間的「經紀人」，丁輝等人壟斷了大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分配。有學者發現，在今天的中國，「農村中以經濟和文化網絡為基礎的各類強勢成員迅速成長，並在農村公共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擁有或者可以調動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稀缺資源，並利用這些資源取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功，進而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⑨只是小說裏的丁輝等人在罔顧公共道德與利益、瘋狂攫取私利之餘，並沒有為他們的家鄉做貢獻而已。

丁輝、賈根柱和丁躍進之流，唯私利而無公德，而「道德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制裁力，使他們合於規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和綿續」^⑩。當「道德」被新的「精英」肆無忌憚地踩在腳下，丁莊的徹底衰頹已不難預見。

五 結語：精英失序的噩夢

經濟學家、精英理論創始人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在其開拓性名著

《精英的興衰》(*Applicazione di teorie sociologiche*) 中，對精英的更替現象做如是描述^⑪：

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幹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然而，根據一條重要的生理學定律，精英不可能持久不變。因此，人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

《丁莊夢》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從李三仁、丁水陽到丁輝、賈根柱、丁躍進等「精英」的更替過程。有學者認為：「鄉村精英身份地位的歷史變化實際上折射出了不同時代的社會要求，集中體現了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的溝通與互動程度。」^⑫透過閻連科的筆觸，在政治、宗族／文化精英到經濟精英的歷史性更替過程中，既有故事的偶然性，更是由歷史的必然性所決定的。而且隨着精英的變換及鄉村權力話語的轉移，傳統的鄉村文化基礎在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之後，再度遭受商品經濟大潮的重創。鄉村的文化功能日漸衰落乃至喪失——最明顯體現在學校被瓜分的事件上，丁莊也隨之失去了生命力。

在《丁莊夢》的世界裏，丁莊精英潰敗，人去村空：丁水陽老人「穿過丁莊時，像一個人穿過沒頭沒尾的溝壑樣。走過從丁莊到學校的那段路，像一個人走在沙漠上。走在沒有人煙的黃河古道上」^⑬。閻連科筆下的「未來」何其悲觀？

丁莊的噩夢並不會結束。

註釋

① 閻連科：《丁莊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該小說早在2005年，由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和新加坡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另有2006年台北麥田出版的版本。

② 陳柏峰：《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頁55。

③④⑯ 閻雲翔著，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260；261；259。

⑤ 賀飛：〈我國農村社會轉型中的精英能動性及其局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53、55。

⑥ 任敏：〈精英流出與農村穩定〉，《甘肅理論學刊》，2003年第5期，頁41。

⑦⑱ 連清川：〈中國社會個體化的正與邪〉（2012年8月13日），FT中文網，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964。

⑧ 近年來，將鄉村精英劃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宗教精英，是被多數社會學研究者所大致認同的劃分方式——只是在具體表述略有差異：如將宗教精英置換為宗族精英、社會精英或文化精英等。根據論述的需要，本文將《丁莊夢》裏的「精英」，劃分為「政治精英」、「宗族／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三種。

⑨⑲ 胡揚：《精英與資本——轉型期中國鄉村精英結構變遷的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136；137。

⑩⑳ 褚穎春：〈江南鄉村精英的百年變遷〉，《江南論壇》，2007年第1期，頁60；60；61。

⑪㉑ 鄭煬和：〈論鄉村精英與鄉風文明建設——從權威與秩序的視角〉，《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13。

⑫⑬⑭⑮㉒ 譚同學：《橋村有道：轉型鄉村的道德權力與社會結構》（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407；406；409；409；415；412。

⑯ 劉偉：〈閻連科的鄉土批判——對《受活》與《丁莊夢》的比較閱讀〉，

《社會學家茶座》，2008年第1期，頁95。

㉓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86。

㉔㉕ 閻連科：《丁莊夢》，頁20；284。

㉖㉗㉘ 梁鴻：《中國在梁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198；73；198-99。

㉙㉚ 何蘭萍、殷紅春、楊勇：〈鄉村精英與鄉村文化的建設〉，《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543。

㉛㉜ 劉博：〈精英歷史變遷與鄉村文化斷裂——對鄉村精英身份地位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思考〉，《青年研究》，2008年第4期，頁48；47。

㉝ 杜贊奇：〈中文版序言〉，載《文化、權力與國家》，頁2。

㉞㉟ 呂世辰、胡宇霞：〈農村精英及其社會影響初探〉，《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25。

㊱ 果戈理(Nikolai V. Gogol)著，滿濤、徐慶道譯：《死魂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㊲ 閻連科、關軍：〈精神上的艾滋病更可怕〉，《大連日報》，2006年1月24日。

㊳ 《故鄉天下黃花》為劉震雲寫於1990年代初期的一部長篇小說，刻畫了趙刺猬、賴和尚兩位鄉村邊緣人物，借助土地改革運動之機，以積極份子身份進據鄉村權力中心，一躍成為該村「精英」之列，並倒行逆施、為非作歹長達數十年。參見劉震雲：《黃花土塬》（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1-354。

㊴ 焦少飛：〈農村強勢成員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財經科學》，2006年第6期，頁100。

㊵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1。

㊶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著，劉北成譯：《精英的興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13-14。